

上编 亲历抗战

黄鹤楼下的“七·七”事变

“七·七”事变爆发，我正在武昌。

上年 8 月，我就读的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停办。手里拿着准备支付一个学期的费用，从长沙来到武汉游览。逗留了二十来天才返回洞庭湖滨的家乡华容。这一次是今年 3 月底 4 月初来的，依旧住在上一次熟识的武昌粮道街一处供学生寄宿的寓所里。目的在寻求职业，没有门路，一天天虚耗时光。

粮道街在蛇山东侧。出街道南口，有一条向西穿过蛇山涵洞的马路。从涵洞近傍上山，沿着起伏的岗峦往北，到黄鹤楼大约一公里。张之洞的抱冰堂、辛亥革命新军起义用过的炮台、毫不引人注意的小土堆陈友谅墓、某名寺院等，都在这条路上。抱冰堂附近有一个小图书馆，一个报刊阅览室，还有两人合抱的大桂花树。到了这里，才知道桂花树多而且高大，为武昌独特景色。抱冰堂西侧山坡下半近代式的红瓦楼房，是清末湖北立宪运动中盖的湖北立宪公会大楼，此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所在地。我上午的时间多半就消磨在小图书馆或阅览室里。6、7 月份狭窄的市民家庭寓所闷热非常。晚饭后有时我自己，有时约

同一二人从涵洞处上山，散步到黄鹤楼，然后经汉阳门大街往南，返回住所。大街上霓虹灯闪动，几家赶时髦的商店，用扩音喇叭播放“桃花江”、“大陆歌”等唱片，翻来复去；走过繁华地段，才感到安静了许多。

7月8日晚饭后，我又一次上山由南往北信步走去。以前这时总有三五游人来往，或者在山顶亭子上纳凉聊天。今天感觉异样，一路上几乎很少碰到游人。经过某寺院缓坡往下，便是黄鹤楼。这时忽然听见前面人声嘈杂，越近越一片嗡嗡。我赶紧走向前面，发现众多人聚集在那里，而且马上知道了他们谈话、吵嚷的内容：昨天日本军队发动进攻，占领卢沟桥，包围宛平城，中国军队奋起抵抗。中日战争打起来了。战事目前正在进行，情势紧急。消息今天下午传到武汉，报纸刚刚发出“号外”。我注意了一下，这时大概是八点来钟，时已黄昏。

黄鹤楼是一座多角木结构建筑。外表陈旧，早已变成了普通茶楼。去年来此，我到底层转过一下，茶座生意清淡。听人说，楼上空空如也，只可供观看近处江景。楼外地面空旷、平坦，东侧的多级石头台阶通往汉阳门码头。台阶宽阔，随地势斜行，中间有平台相间。聚集在这里的人群，散布在从楼外空地经过层层台阶到汉阳门街口。他们三五人、数十人、上百人围成一堆一团，随分随合。少数人手里拿着“号外”，别人争相传看。没有人长篇大论讲演，有人在围圈中挥动手臂，大声呼喊。我变换地点，各处听听。人们急切打问消息，凭自己的见闻，骂日本人

坏，诉说日本对中国欺侮压迫的种种横暴。他们热烈讨论和争论的问题是，战争会不会大打起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跟日本人拼？我们不打，中国的地方能不能收回，怎么收回？大打起来，中国打得赢吗？不会亡国吗？29军干得好，可是谁知上面的主意呢？等等，等等。各讲各的，不过大家最关心和比较赞成的，一是认为不抵抗不行，应该支援29军，二是中国人多地方大，打下去不会亡国，要紧的是中国人要齐心，不能人心不齐。我粗略估计一下，8点多钟，聚集在这里的，可能近两千人。所有的人显然同我一样，是游览、散步、纳凉，路过偶然碰到一起的。他们之中各种人都有，从穿着、说话的口气、口音可以知道，有住家市民、店员、工人、人力车夫、小商贩、公务员、知识分子、学生、无职业的闲散人员和外地过路人等等，也就是他们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。这么多人共同的情绪是愤怒、兴奋、期待，等着看明天的情况，最好是打胜仗的消息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完全是偶然、意外、非预期的。他们那种情绪和所表达的占多数的看法，又是意料之中的和不可避免的。在一切已经具备的环境下，报纸“号外”消息，就像两块石头相撞冒出的火星，必然在瞬间点燃一场火，或引发一场爆炸。它的潜在含义，当时我只顾兴奋不已，没有形成什么概念。9点多钟在返回寓所的路上，忽然感到，这不就是爱国思想吗？不就叫民族精神吗！

到寓所以后，把黄鹤楼下的见闻告诉几个暑假将要回

家的高中学生，大家热烈议论了一番。第二天和以后好几天，头一件事就是上山至报刊阅览室看报纸新闻。看报的人虽然互不相识，也情不自禁地在一起讨论起来。有人说，8日晚上汉口江汉关等处也聚集过许多人。过了几天，靡靡之音的“桃花江”，居然也从大街商店喇叭中消失了。听说汉阳门到江汉关的轮渡上，中学生正在募捐慰劳29军。大概个把星期以后，报纸登出海报，汉口一家大戏院，上演剧作家顾无为编的话剧《卢沟落日》。标价法币一元，观看的人争先恐后。对于住公寓的人来说，一元法币是五天的食宿费，也有人决心去看。

这时，我是一个落后的书斋式小知识分子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家庭是中小地主。府城乙种师范毕业的父亲早年去世，家景衰落。我主要是接受封建教育，与“诗云子曰”打交道。但阅读能力增加，也使自己粗知世事。社会生活现实的矛盾，不能不在思想上产生矛盾。国学、故纸堆中的空虚、宁静，抵挡不过客观环境变化的强烈刺激。甲午战争、马关条约、二十一条、“五·九”国耻等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说来自己已经并不陌生。“九·一八”时，从县城里偶然见到公务人员衣袖上带个黑箍，缝着“国难”字样。后来才听说，日本军队一个早晨占据了东北三省。就在这以前以后，也见过衣袖上带白箍的差人下乡，醒目的大字是“剿匪”。官方报纸上经常宣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在持中间态度的知识分子中，也有人对蒋介石很不恭维。上年6月，两广军队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子开进湖南边境。

湖南省主席，也就是临时脱下军装、换穿长袍马褂、给我们演讲《大学》章句的国专校长何键，他先是骑墙观望，然后宣布“拥护中央”。蒋介石软硬兼施把对方压下去了，人们觉得北上抗日理直气壮，但庆幸避免了一场战争灾祸。在国专那样落后的角落，同学中也有人私下谈论“祖龙将死，中国将变”。这是用秦代术士骂秦始皇“今年祖龙死”的话来骂蒋介石了。

以前我上过半年县立师范补习班，每星期一全校师生要集合做“朝会”，齐唱“三民主义，吾党所宗……”国专课程经史哲文都是老古董，与它们平列的《党义》一门，由一位姓陈的国民党省党部要员讲授。他发的讲义中，记得有“三民主义的连环性”一节，我当时感到很像中学生的命题作文。三民主义也好，“党义”也好，都引不起我的兴趣。对于蒋介石，说不上有何认识。蛇山漫步中，某次走近陈友谅墓，忽然有感，很快哼出一首《过陈友谅墓》的诗。到陕北以前写的诗都忘得无影无踪了，惟独这一首有时想起来念一念：“紫荆山上孝陵园，碣石崔巍车马喧。黄鹄矶畔汉帝墓，杞棘荒圯无人过。我来凭吊读遗碑，老乌哑哑相和吹。碑上淋漓云何事，似叹英雄不得志。鄱阳一战功未成，泰山鸿毛从此分。吁嗟乎！垓下若教刘邦死，如今楚帝称项羽。”开头两句点出了南京和那个人的地位，收尾两句是前人所说的“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”。蒋倘若当初失败了，如今也是个“寇”。这和“祖龙将死”的意思差不多。反感，但不带特定色彩。报纸上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说“剿匪”了。刊物上有过反驳“联合阵线”的文章，我当然不知何谓“联合阵线”，但大致也可以揣想出那是针对共产党的主张讲的。后来同样的文章也很少见到。华北情况怎样，以前我不曾留心。表面上很平静，若无其事，只有长江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大火炉热浪的冲击。我就是在这种形势和思想状况下经历上述黄鹤楼下的“七·七”事变的。

前个把月，我已经打算回家了，等待家里筹寄路费。正当这时，一位姓魏的小同乡，念完长沙岳云高中，来武汉参加大学招生统一考试。他要我等他考试结束以后一块走。需要的钱由他借给，并请我去汉口看“卢沟落日”。“卢沟晓月”被认为燕京八景之一，由来已久。剧作改“晓月”为“落日”，与品评风景无关，是在用这个形象说出中日战争的结局，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，日本的太阳将在卢沟桥坠落下去。进入剧场，楼上楼下，满满当当，座无虚席。剧情变化中，忽然一驾飞机从观众背后高处直冲舞台，同时发出轰隆响声，引起一阵骚动。创作上这种小手法，看来也产生了刺激性效果。演出结束，观众走出剧场，热烈议论。虽然谁都知道它不真实，也愿意从中感到一点满足。

回到家乡，已经是7月底或8月初。农民收过早稻，生活暂时安定。邻里亲朋来谈，问起消息，我首先就告诉他们黄鹤楼下所见那一幕。乡村没有报纸，外面消息不过偶有传闻。家在山区，县城有熟人和可以阅报的简陋“民

众图书馆”，相距二十华里，过几天才去一次。在确知中国抗战全面打起来以后，意识到了自己的书斋生活将要变，但是如何变，变到哪里去，一派茫然。

沉寂与变动

战争在前方打了三四个月，华容这个地方仍处在死水般的沉寂中。上海失守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，对于多数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过去的。

沉寂，当然绝非世外桃源。多数农民知道中国抗日了。但他们首先要顾及眼前，该怎样在重租、苛政、饮鸩止渴的高利贷等残酷压榨中挣扎生活下去。知识分子有关心时局的，有更关心身边近事的。就在 6、7 月间，县里很有势力的劣绅张作典担任县财政局长，在与对立的一派争夺权利的斗争中失败，贪污舞弊被揭发，案情继续发展。一些人拍手称快，一些人惴惴不安。最后查实，张担任财政局长两年又一个月，共侵占公帑及应该交出的各种款项，合计十三万五千余元，又谷若干石。有人算了一笔账，通常 7、8 月间新谷上市，一元六角一石。十三万五千余元是十万余石谷。全县人口三十万每三人就要缴纳一石谷归入他的私囊。这笔钱用于抗日军费，足供满员正规军一个师全月开支而有余。张因失去了后台，第二年被枪毙。省里宣布其罪状的文告上有“张作典派员征收摊款之时，屡有无故拘押人民暴行之举”；“华容劣绅狼狈为奸，

被害人民既不敢言，又不敢怒”；张“姿横暴戾，尤为贪污之魁。其恃势欺凌，蹂躏人民之处，凶恶万端，人民恨之入骨”等等。张的贪污横行，无疑是比较突出的。但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下，同类性质的事实司空见惯，不过具体情节有差异，绝大多数没有暴露公布于世罢了。报纸上说的全民抗战，在洞庭湖畔这块土地上不见声息。这种情况和普遍存在的统治腐败，劣绅恶霸当道，人民深受压抑，无人过问，联系在一起。

回家以后，我心绪烦闷，再也坐不下来专心致志读书。一个关系密切的私塾同学叫程稚香。地主家庭，居住县城西乡。上年我们一块赴长沙，我进国专，他入艺文中学。“七·七”以后他休学在家。我们这时又在一起盘桓，打发时光。

程稚香这个家庭对我当时求学和后来的生活很有影响。我上私塾的过程中，连续三年在他家“起爨”就读。老师是县里教过整整两代人的塾师、老秀才蔡瑞芝先生。学问根底扎实，文字雅驯，非训蒙塾师一类。早岁到省城长沙下过“秋闱”，颇知故老相传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大文人王闿运等湖南人物掌故。他提到曾国藩总要敬称“曾文正公”，不过说曾死时人们写的一副挽联：“杀贼功高，果为一朝真宰相；和洋罪大，早死三年是完人”，则是湖南士绅的“公论”。程稚香的父亲也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，在家过田园生活。他钦佩蔡老前辈的学问，特持延聘在家培养自己的儿子。他觉得我是他儿子的“益友”，对我也

就表示关心。他家有不同注释本的杜诗，前人评论的所谓“陶甘杜苦”、“郊寒岛瘦”、“元轻白俗”、“韦淡”等，我头一次就是听他说的。他有位挚友朱婴是大革命时革命分子，后来长期潜居上海从事文化活动。朱婴新从上海书写寄来的多幅大字，他观赏时也叫我们看看，很快就又收藏起来。至于朱为何许人，他不肯多谈，只是说“他是做大事的”，“是想改造世界的”。他家常年订有省城报纸，好像是《湖南日报》。与读书有关的消息，例如章太炎在苏州讲学、叶德辉其人、长沙要印行《叶德辉全集》等，是他阅报时跟我们随便谈及的。我最初并不爱看报纸，时间长一点，渐渐对报纸产生了兴趣，并且从只着重看与读书有关的内容，变到先要翻翻时事新闻。后来回想过，如果没有在程家“起爨”的三年，我的思想肯定更加落后封闭，对外面的世界更加隔膜，肯定不会走出家乡，不会那样直接感受伟大时代风暴的强烈震荡，并投奔到民族解放战争炮火连天的最前线去。

日军占领平津，华北沦陷，给偏僻的华容地方多少也带来了一点影响。本地老一辈文人贺冕多年在北方活动，听说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议员，以诗人著称。这时他回到了家乡，住在县城北面的老家万庾镇上。我觉得生活实在空虚无聊，便同程稚香一起去看望贺老先生，请他接受我们拜他为师，攻习诗文。他那时闲居，答应了我们的请求，就住在他家里。头一次见面，见他客厅里挂的书法中，有一幅署名“散原”，是一首五言律诗。我们不了解

散原是谁，后来问及，他才说到散原是当时被称为宋诗派代表人物的陈三立，即现在学界所推重的陈寅恪的父亲。那首诗是他们唱和中陈写给他的。人们祝贺为诗人，大概与此有关。他每隔一两天，晚上来我们的房间里谈一次话，海阔天空。对于我们写的习作，他是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，发表意见，不下笔改文字。某次，我仿照杜甫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写了一组诗，背景是城乡出现各种名目的招兵单位，买卖壮丁，或者强拉行人。他看了以后嘱咐：“不要拿出去给人看，人家会以为我们不赞成抗战。”他儿子贺某打牌赌博，有时也走进我们的房间闲谈。有一次，老先生郑重地念着他儿子的名字说：“你们不要跟他通钱财，倘若他欠了你们的钱，我是不负责的。”这一些，可以看出他老于政治阅历，处事细密。我在贺家学习生活结束，快接近 1937 年末尾。家乡也就在沉寂中走过了抗日战争早期的日子。

战争发展的非常形势急剧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某些关系和状况。1938 年初，那种改变的波浪终于冲击到了华容这个地方。以前听不到的议论、看不到的书，这时听到、看到了。一位素无交往的青年，借给我一本叫《唯物主义与伦理哲学》的书，令我吃惊。其中反复出现康德、黑格尔、卡尔、伊里契、某某夫人等人名，摘引他们的论点，指出他们是谁和为什么是唯心论、唯物论、二元论，加以评说。我既不知道那些人物，当然也无从索解书上的理论。硬着头皮往下看，仍然稀里糊涂。其实那不是一本禁

书，它流行很广。但对我来说，内容太新鲜了。我想从头求知，但并没有由此对孔学产生动摇。

与程稚香在春节以后见面，从他那里知道，多年隐姓埋名住在上海的朱婴同儿子、女儿回到家乡来了。知识分子有去朱家拜访，有打问朱活动消息的。朱仿佛成了“要人”。我意识到了这是抗日战争造成的人们的政治态度、思想动向的改变。朱在上海办一个名为《我们的学校》的小型刊物，他儿子叫朱允禧。因为程稚香的关系，我与朱允禧很快相识，看到了《我们的学校》。其中某期登有一则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消息，不过一二百字。我连续看了几遍，好像是一个人踟躅在暗洞中，忽然发现前面隐约有个亮点，有个出口。到延安去？这个念头在头脑里滋生、膨胀起来。

形势是这样：或者是在家乡恶劣的环境中苟安下去，那实在难以容忍，不情愿，而且苟安的日子又能维持多久呢？或者改变生活，到通往抗战前线的地方去，这除了意味着舍弃家园，实际行动上又到哪里去接头，行得通吗？忧虑国家民族命运，寻求个人出路前途，两者结合在一起，拿定主意，到延安。确知长沙有八路军办事处，第一步先到那里去弄清情况。

1938年5、6月间的长沙充满抗日战争后方的浓烈气氛。头年冬天，日机多架轰炸长沙，欠下了中国人民一大笔血债。自那以后，空袭警报时鸣。虽不说是风声鹤唳，居民仍经常要把注意警报放在心上。旅馆跟从前不一样，

住着不少操江浙安徽一带口音的旅客，有的拖家带口。茶房称他们为“下江人”。他们是不愿意当亡国奴，历尽艰险，逃亡到后方来的。我看见一家人，孩子在父母身边天真烂漫唱儿歌，“锄头，锄头，要奋斗呀！”大人却紧皱双眉，为无家可归、生活窘迫发愁。旅客中军人也很显眼。他们都是从前线失散下来，找不到或者没有原部队可找了，准备另谋差事。一个身材细高的上校，携一年轻女子同住。三两天后，他妻子跟踪追来，原来上校从前线来到后方，没有回部队，先纳了一名幼妾。大批伤兵去年就开始运送到长沙，他们得不到必要安置，占领商店旅馆，并一度包围省政府。市民惊恐，与伤兵情绪对立。当局作了一些处置，秩序得到恢复。5、6月间，正当台儿庄战役以后，新的伤兵增加，问题又再次突起。我先在市区旅馆落脚，不久住到小吴门外郊区一家住学生的寓所。到市区去要经过伤兵集中的四十九标兵营外面。附近戒备森严，行人都加快步子走过去。伤兵仍有从围墙上翻出来，三三两两在街上游荡，滋生事端的。通衢路口，张贴某某集团军、某某路军学兵营、训练班等的招生布告，五颜六色。布告的发布者不知都是什么人，好像有顾祝同、汤恩伯那些名字。清华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临时校址、联络处等也见于街头路边的告白、通知单上。它们只受到少数人的注意，但也给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话题，谁人在哪里讲演，谁的行踪如何等等。马路上的书报地摊东一摊，西一片，兴旺热闹。报纸、刊物、时事小册五花八

门。《毛泽东自传》、《毛泽东论游击战》、《朱德访问记》、《彭德怀印象记》、《如此韩青天》等，都摆在那里。它们尤其吸引浏览者、购买者的注目。我翻开一本《文摘》，有一篇郭沫若写的与蒋介石的见面和谈话。题目和内容全忘记了，只记得其中一句话，蒋问郭：“你贵庚？”大概因为是《文摘》只载郭与蒋见面的内容，不及其他。那是郭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散文。在上海指挥“八·一三”抗战的张治中，这时任湖南省主席，他提出动员民众，改革行政。我住的郊区学生公寓老板是母女俩。女约二十来岁，每天早晨穿起规定的服装受军训两小时，回来满脸兴奋。市民看来表现出是愿意组织起来参加抗战的。

鲜血、腐败、愁苦、振奋、变革、希望、力量……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，合制成一卷正在展开的空前大画图。它的鲜明的基本色调是抗战和信心。当时有人说湖南是“中国普鲁士”。我在全中国抗日战争高潮中，短暂生活于“中国普鲁士”的首府，接触到的大致就是这些。

这次我来长沙，是根据朱婴刊物提供的消息，寻找去延安门路的。我知道朱，他不知道我。50年代，从报纸上知道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，以及担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等。其间我两次去西安，没有时间联系谋面。1964年，我国举办北京科学讨论会，亚非拉美几个国家科学家出席，毛主席与其他领导人同各国学者见面。日本代表团五十余人，团长、副团长是坂田粒子学说创始人坂田昌

一、历史学家井上清。我是中国代表团团员。会后多数日本学者访问延安、西安，生物学家松浦一任团长。我陪同前往。到西安以后，越南、印尼、非洲国家学者也从其它参观地来此会合。省长举行招待会，我席终时致词。话不长，但每讲一句都要译成三四种语言。招待会后我问省外事干部，今天省里出席的都有谁？他一一说明，科委是副主任朱婴。呵！朱婴。我请外事干部与朱联系，明天上午我去拜望。这位干部坚持请朱来宾馆。第二天见面，我首先自我介绍。他说，难怪昨天晚上听你讲话总觉得是我们家乡口音。据他告知：贺冕在抗战中被推为华容参议会议长，后来是湖南文史馆馆员，他们间有书信、诗文来往。程稚香土改中自杀，朱允禧在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。他本人 1938 年创办东山中学，青年人学踊跃。前一段能够正常上课，但也受到掣肘。武汉失守以后环境一天天恶化，学生纷纷被迫辍学。最后学校关门，他带领十几名青年打着“抗日宣传旅行团”旗子，徒步从家乡走向陕北，沿途遭遇不少困难，终被克服。他叙述的这段经过，从一个局部反映了抗日战争前期湖南乡村统治状况，和一些青年在抗战道路上的选择。朱在十年动乱中被折磨致死，那是后话。

我一到长沙，很快见到了几位国专同学和其它学校学生。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地址和它的领导人“徐先生”——徐特立。徐老是湖南教育界前辈，青年时写血书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。“四十始学横行字”，到法